

企业家才能、营商环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分析

薄文广^{1,2}, 周燕愉¹, 陆定坤¹

(1.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天津 300071;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天津 300071)

摘要: 文章通过使用2016年35个城市的上市公司微观数据, 并匹配相应的营商环境指标和企业家才能指标数据, 定量分析了企业家才能、营商环境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着营商环境“门槛效应”, 即企业家才能只有与一定的营商环境相结合, 才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积极作用; 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和产业差异特征: 沿海地区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要强于内陆地区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企业家才能对传统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大于对战略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

关键词: 企业家才能; 营商环境;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2154(2019)08-0085-13

DOI: 10.14134/j.cnki.cn33-1336/f.2019.08.007

Entrepreneurship,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Corporat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Micro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BO Wen-guang^{1,2}, ZHOU Yan-yu¹, LU Ding-kun¹

(1.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re for China Econom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micro data of the listed companies in 35 cities in 2016 and matching the correspond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indicators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data, this paper aims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exists in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on the firm-level TFP, which means that entrepreneurship will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TFP only when it is combined with a certain business environment. Moreover, there are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industrial differences, which indicate that the influence of entrepreneurialism in coastal areas on TFP is stronger than inl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influence of entrepreneurs on the TFP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s larger than tha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Key words: entrepreneurship; business environment;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reshold effect

一、引言

由更注重规模的高速度发展转向更注重效率的高质量发展, 是当前党中央根据国外环境变化以及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特征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根据索洛模型,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一国经济的可持续

收稿日期: 2018-07-06

基金项目: 天津市教委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推进未来科技城京津合作示范区发展研究”(2016JWZD12); 天津市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计划“新时代下产业有序转移与我国区域发展空间重塑研究”(63192313); 天津市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计划“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耦合研究”(17ZLZXZF00250)

作者简介: 薄文广, 男, 副教授, 研究员, 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研究; 周燕愉, 女,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公司金融和区域经济研究; 陆定坤, 男,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研究。

发展提供了可能,通过机制创新和技术进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并依靠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我国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1]。一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宏观上依赖于政策环境的改善以及区域间的协调与合作^[2];从微观上则取决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资本和人力配置等因素。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企业更应该在适应新常态的环境下积极探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改善企业绩效的方法。

实际上,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非常多,比如产业集聚^[3]、知识资本^[4]、环境规制^[5]、政府补贴^[6]、研发投入^[7]和其他一系列公司特征^[8]等。作为企业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隐性生产要素,企业家可以通过发现机会、创造和转化价值等综合应变能力为微观企业绩效做出贡献。熊彼特(1990)^[9]从创新角度出发,探讨企业家精神对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的作用。贺小刚(2006)^[10]从组织能力角度出发,认为企业的组织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家才能的影响,企业家才能直接或间接地对企业成长产生作用。

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同时对于当前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企业家在设立和运营企业的过程中显而易见地需要和地方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频繁打交道,进行各种要件准备及报备等审批和监管手续。从宏观经济层面看,地方政府对于辖区内的企业发展甚至发挥着“点头不算摇头算”^①的作用。因此,地方政府主导下的营商环境^②建设自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7年6月的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会议上更是提出了“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这一新理念,强调了营商环境对企业运营的决定性作用。从微观企业层面看,营商环境是企业创立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良好的营商环境将有益于企业的设立、运营、融资和绩效,企业运作的全过程都离不开营商环境的渗透作用^[11]。正是由于营商环境对企业家才能是否发挥作用具有巨大的影响,企业家才能在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积极作用时是否会受到当地营商环境的制约则成为本文的关注点。

本文拟应用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企业数据来深入分析企业家才能以及营商环境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文章第二部分提出研究假设,给出一些有待证实的命题;第三部分说明样本来源、变量构建和具体实证研究方法;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结果及解释,最后给出主要结论和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和假设

(一) 企业家才能与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1)包含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的企业家精神来源于企业家的才能^[12],企业家才能是企业家发现资源、创新利用和创造价值的必备才能^[13],因此较高的企业家才能有利于企业的创新和创业,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2)虽然企业家才能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非常有限,但是企业家可以通过其才能提高企业的组织能力,进而促进企业绩效^[10],因此企业家才能可以间接促进企业绩效进而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3)李唐(2016)^[14]分析了企业家年龄效应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U型关系,认为40到50岁的企业家所在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其他年龄段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企业家年龄是企业家经验和能力的一部分,企业家才能会随着年龄和任期的增长而提高。基于此,本文认为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发挥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做出如下假设:

H₁: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二) 企业家才能、营商环境与全要素生产率

作为整个营商环境的微观个体,企业和企业家显然会受到项目所在地营商环境的影响。营商环境是企业开设和经营所面临的一系列外部环境因素的总和,是衡量营商难易程度的一种综合概念。营商环境通常

①“点头不算摇头算”是指虽然地方政府希望扶持辖区内企业发展,但也不能确保企业发展的成功,因为实际上一个企业发展的成功与否取决于非常多的因素,如企业家才能、技术水平、高素质的员工甚至营商的文化等,但如果地方政府想限制辖区内相关企业的发展,则会有非常多的方法。

②实际上,从某种程度而言,地方政府营商环境的好与坏相当于给企业减少或增加了一些时间和人力物力耗费等制度成本,因而在所有其他成本不变的时候,营商环境较佳地区的企业与营商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相比,竞争优势会更大,也更有助于相关企业取得更大的利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理性的企业家自然会优先选择营商环境较佳的地区运营,在招商引资发展辖区经济的大背景下,营商环境近些年来自然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

是包括制度软环境、市场环境、商务成本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环境等在内的一系列企业设立和运营过程中必须与之打交道的综合体系。作为政府管理和影响微观经济个体的综合表现,营商环境对企业创立、运营、融资、绩效等各个方面都会产生影响。Wach(2008)^[15]在调研波兰南部中小企业后发现,营商环境越好越有利于当地中小企业的发展。Klapper等(2011)^[16]通过对世界银行2008年的营商环境调查数据研究,验证了创业与营商环境之间的正向关系,认为良好的营商环境(比如高效率 and 低成本的商业注册登记)会促进更多的创业活动发生。谢海东(2006)^[17]建立起投资经营环境和民营企业绩效的直接联系,认为在利润增长机制和投资诱导的两重作用下,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并提出了融资政策的改善对企业绩效增长具有非常强的影响这一观点,说明了营商环境会影响企业融资和绩效。

而对于当下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在中央政府的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制度设计下,中央和地方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不对等(例如当前更有利于中央政府的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具有发展辖区经济的巨大动力和政治激励机制,因此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种改革举措来吸引企业入驻并发展经济。而对于广大企业家而言,企业家才能是在地方政府主导的营商环境背景下发挥的,其创业、投融资决策等都会受到营商环境的约束。例如,行政审批制度的繁琐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企业家的创业行为^[18],行政干预的减少、合同执行时间的缩短和成本的降低、司法的效率与公正、市场化等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19]。因此,本文认为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会受到当地营商环境的制约,因此上面 H_1 的基础上,继续做出如下假设:

H_2 :在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都处于深刻转型期的大背景下,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可能存在着地方政府主导的营商环境的“门槛效应”。

三、模型设定

(一) 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我国 A 股上市公司 2016 年的横截面数据为样本,在剔除公共事业行业和金融保险行业样本以及非正常的 *ST 和 ST 公司样本后,匹配我国 35 个大城市营商环境指标和企业家才能指标,剔除样本数据缺失企业,最终剩余 1285 个观测样本。其中,营商环境指标数据来源于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发布的《2017 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20],有关企业家才能指标的详细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其余公司治理的相关数据均来源于 Wind 数据库。

(二) 变量解释

1.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全要素的估计方法已有多位学者进行分析和修正,本文借鉴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21]、柳荻和尹恒(2015)^[22]以及 Yasar 和 Raciborski(2008)^[23]学者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方法,采用 OP 方法和 LP 方法分别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_OP 和 TFP_LP)。

OP 半参数方法克服了传统 OLS 方法的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传统 OLS 最常用的方法是利用如下 C-D 生产函数来估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Y_{it} = A_{it} L_{it}^{\alpha} K_{it}^{\beta} \quad (1)$$

其中, Y_{it} 表示在企业 i 在 t 年的产出, A_{it} 表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L_{it} 表示企业的劳动投入, K_{it} 表示企业的资本投入。对方程式(1)取对数得式(2):

$$\ln Y_{it} = \alpha \ln L_{it} + \beta \ln K_{it} + \ln A_{it} \quad (2)$$

为方便起见,分别用 y_{it} , l_{it} , k_{it} , 表示企业产出、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对数,得到式(3):

$$y_{it} = \alpha l_{it} + \beta k_{it} + u_{it} \quad (3)$$

此时残差项 u_{it} 包含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数形式的信息,由于有些企业的生产效率在当期会被观测到,进而影响企业当期投入决策,所以使用 OLS 估计方法容易产生同时性偏差和内生性问题。从样本选择角度上讲,样本中包含的仅有生产率较高或不至于被淘汰的企业,因此容易高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前一个问题,可通过将残差项分拆成两项,一项为影响企业当期选择的生产效率 w_{it} , 一项为真正意义上不可观测的生产效率 e_{it} , 则有:

$$y_{it} = \alpha l_{it} + \beta k_{it} + w_{it} + e_{it} \quad (4)$$

而对于样本选择偏差,OP方法通过考虑到企业的生产概率而得到解决。OP方法采用企业投资作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代理变量:

$$K_{i,t+1} = (1 - \delta)K_{it} + I_{it} \quad (5)$$

其中 I_{it} 是企业 i 在时间 t 的投资, K_{it} 是企业 i 在时间 t 的资本存量。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进行投资,除了考虑资本存量外,还会考虑可观测到的影响当期生产效率 w_{it} 的要素。考虑到后期求资本(取对数)系数时的一致性,且取对数之后不会改变数据的性质和关系,因此投资(对数)函数由式(6)表示,并通过反函数法则求出式(7),将式(7)代入(4)得(8):

$$i_{it} = g_i(w_{it}, k_{it}) \quad (6)$$

$$w_{it} = g_i^{-1}(i_{it}, k_{it}) \quad (7)$$

$$y_{it} = \alpha l_{it} + \beta k_{it} + g_i^{-1}(i_{it}, k_{it}) + e_{it} \quad (8)$$

此时,令 $\varphi_{it} = \beta k_{it} + g_i^{-1}(i_{it}, k_{it})$ 表示资本对企业的贡献,使得:

$$y_{it} = \alpha l_{it} + \varphi_{it} + e_{it} \quad (9)$$

OP方法首先估计劳动力在生产函数中的比例(α),求出不考察资本的OLS回归残差($\varphi_{it} + e_{it}$);再令 $\emptyset_{it} = y_{it} - \alpha l_{it}$,以拟合的残差作为因变量,投资和资本作为自变量:

$$\emptyset_{it} = \beta k_{it} + g_i^{-1}(i_{it}, k_{it}) + e_{it} \quad (10)$$

此时,根据式(5)和(6)可知, k_{it} 可由 $i_{i,t-1}$ 和 $k_{i,t-1}$ 的函数表示,所以 $g_i^{-1}(i_{it}, k_{it})$ 与滞后项 $g_i^{-1}(i_{i,t-1}, k_{i,t-1})$ 有稳定的函数关系。令 $g_i^{-1}(i_{it}, k_{it}) = h(g_i^{-1}(i_{i,t-1}, k_{i,t-1})) + \rho_{it}$,并将式(10)可转化为:

$$\emptyset_{it} = \beta k_{it} + h(\varphi_{i,t-1} - \beta k_{i,t-1}) + \rho_{it} + e_{it} \quad (11)$$

由此估计资本系数 β ,最后结合劳动系数和资本系数,利用索罗残值方法估算 TFP^[21]。

作为对OP方法的修正,LP半参数方法选取中间投入作为工具变量,扩大了工具变量的可选择性,在解决联立性和样本选择性偏差的同时也解决了投资作为中间投入的偏差^[24]。本文采用LP方法计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_LP)作为模型稳健性检验的因变量。

2. 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家才能的度量,已有大量学者进行了深入探究,贺小刚(2006)^[10]认为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在于发现机遇、建立合作关系、经营创新、应变战略和资源整合,企业家将从战略和创新角度、组织能力角度、社会关系角度等不同方面直接或间接对企业绩效产生正面影响。也有学者认为组织才能是衡量企业家才能的一个重要维度,是企业家所必备的囊括全局的能力^[25]。寇元虎(2015)^[26]基于此提出了企业家才能的三个维度:行业资本、政府资本和创新洞察能力,认为行业资本是企业家从行业中获取信息资源的能力,政府资本是企业家获取政府资信和资源的能力,创新洞察能力则与企业家精神高度相关,是企业家发现机遇和挑战,敏锐地做出决策并提高企业价值的的能力。

本文部分参考上述学者的分析角度,将企业家才能分为三个维度:政府关系能力、社会关系能力和专业能力。考虑到后期模型的数据对应关系,本文将讨论的企业家限定为公司的总经理(若无则用CEO替代),基于国泰安数据库中高管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将这三个维度细分为8个详细指标,并且沿用寇元虎(2015)^[26]的计量方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度量企业家才能。

政府关系能力维度衡量企业家的政府背景,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家更容易从“关系”中获得潜在的利益和好处,比如财政支持和对财产权的保护等^[27]。本文采用政府的任职机构层级和任职状态来衡量企业家的政府关系能力。任职机构越高的企业家将有更高的政府关系能力,政府职位在任的企业家比曾任或没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家更具有政府关系。

社会关系能力维度衡量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本文采用海外背景和金融背景度量其社会关系能力。贺小刚和李新春(2005)^[12]检验了企业家背景因素对企业家才能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企业家背景因素越好将会显著提高企业家的才能。本文采用企业家是否参加海外求学或者海外任职作为衡量海外背景的标准。另一个度量指标是企业家是否具有金融背景,具备金融背景的企业家更具有财务分析能力和资金筹资能力,将间接促进企业的成长和发展。

专业能力维度衡量企业家的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程度,本文采用企业家年龄、任职时间、学历和是否具有高级职称这四个指标来度量企业的专业能力。企业家的实践经验和能力会随着企业家年龄和任职时间的增加而提高,学历和高级职称则衡量企业的专业知识水平,相关研究表明企业家学历越高越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战略能力^[12]。由企业家的年龄和教育水平所反映的信息处理能力和知识基础也有利于促进企业对外部知识和资源的获取^[27]。企业家才能度量指标及涵义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企业家才能度量指标及涵义

企业家才能维度	符号表示	指标解释
政府关系能力	ServiSts	政府背景_任职状态,现任=2,未知=1.5,曾任=1,无政府背景=0。
	InstiLv	政治背景_任职机构层级,中央=3,省市级=2,县区级及以下=1,无政府背景=0。
社会关系能力	Oback	海外背景,海外任职或海外求学=1,无海外背景=0。
	Fback	金融背景,具备金融背景=1,无金融背景=0。
专业能力	Age	年龄,取观测年份企业家年龄。
	Peri	任职时间,取到观测年份为止任职时间。
	Edu	学历:硕士及以上=2,本科=1,大专及以下=0。
	Title	是否具有高级职称,有=1,无=0。
综合指标	TALENT	采用主成分分析合成一个综合指标。

3. 营商环境。关于营商环境的数据化度量最初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这些报告以国际化视角撰写,其中对中国的营商环境度量采用上海(权重为55%)和北京(权重为45%)两个代表城市的综合指标。世界银行在2008年发布了《中国营商环境报告》^[28],报告中包含2007年35个城市的营商环境排名,报告选取了四项与营商环境有密切关系的指标:开办企业、登记物权、获取信贷、强制执行合同。虽然这几方面对于企业都至关重要,但该报告的指标数据年份较早,没有考虑到企业营商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商务成本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生态环境等因素。其中,软环境是企业决定投资的最重要的因素,市场环境决定了盈利的空间大小,且生态环境和商务成本越来越重要。因此本文的营商环境指标将采用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发布的《2017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20]的度量方法和数据,把营商环境分为六大类指标,即软环境(权重25%)、市场环境(权重20%)、商务成本环境(权重15%)、基础设施环境(权重15%)、生态环境(权重15%)、社会服务环境(权重10%),来测算中国35个大城市的营商环境指数。其中,软环境指标的数据来源是世界银行公布的营商环境数据,其余环境指标的来源是各个城市环境公报和城市统计公报。

4. 其他控制变量。以往的研究中,有大量文献认为企业的特征因素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影响^[29],因此本文加入企业内部的一系列特征因素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包括资产负债率(DTOA)、资产回报率(ROA)、企业的成立时间(AGE)和资本性研发支出(RESEARCH)。

(三) 研究模型

根据假设 H₁,构建横截面回归模型进行检验,考虑到模型的遗漏变量问题和稳健性,在分析时采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做法,构建模型1:

$$TFP_i = \alpha + \beta_1 TALENT_i + \beta_2 ENVIR_i + \beta_3 controls_i + \varepsilon_i \quad (12)$$

其中,TFP_i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被解释变量。TALENT_i是企业家才能,是模型的解释变量。ENVIR_i为营商环境,是区域层面的控制变量;controls_i是企业特征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资产负债率(DTOA)、资产回报率(ROA)、企业的成立时间(AGE)和资本性研发支出(RESEARCH)。

根据假设 H₂,本文借鉴薄文广等(2005)^[30]以及张宇和蒋殿春(2014)^[31]关于门槛效应的分析方法,加入营商环境与企业家才能的联乘项,构建模型2:^①

$$TFP_i = \alpha + \gamma_1 TALENT_i + \gamma_2 ENVIR_i + \gamma_3 ENVIR_i TALENT_i + \gamma_4 controls_i + \mu_i \quad (13)$$

^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基于微观数据可得性,本文的数据样本是截面数据而非面板数据,因而无法使用当前主流的门槛回归模型如 Hansen(1999)。为了减小引入的联乘项可能造成的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或自相关,本文在计量模型后分别进行了稳健性和内生性分析,以更好支撑计量结果。

四、实证分析

(一) 企业家才能的主成分分析

本文采用 SPSS 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能从选定的指标体系中归纳出大部分信息,主成分的权数根据其方差贡献率来确定,因为方差贡献率反映了各个主成分的信息含量多少。本文在度量企业家才能综合指标前先用 KMO 和 Bartlett 检验,KMO 检验是对变量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的检验,具体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根据常用度量标准,KMO = 0.608 > 0.5,可以做主成分分析。表中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的 p 值接近于0,远小于0.05,同样说明可以做因子分析。

总方差解释(表3)给出了各主成分解释原始变量总方差的情况,表中保留了五个主成分,集中了原始变量总信息的80.903%,说明所保留的五个主成分的构建效度良好。根据成分得分系数矩阵(表4),可以写出主成分表达式,主成分表达式为:

$$F_i = z_{1i}X_1 + z_{2i}X_2 + \dots + z_{10i}X_{10} \quad (14)$$

其中 $X_1 \sim X_{10}$ 是指标准化后的变量值。根据方差贡献率以及主成分表达式,企业家才能指标的综合评分公式为:

$$TALENT = 0.301F_1 + 0.216F_2 + 0.178F_3 + 0.165F_4 + 0.141F_5 \quad (15)$$

表3 解释的总方差

成份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积累%	合计	方差的%	积累%
1	1.948	24.346	24.346	1.948	24.346	24.346
2	1.399	17.482	41.827	1.399	17.482	41.827
3	1.150	14.376	56.203	1.150	14.376	56.203
4	1.066	13.327	69.530	1.066	13.327	69.530
5	0.910	11.373	80.903	0.910	11.373	80.903
6	0.765	9.562	90.466			
7	0.674	8.423	98.889			
8	0.089	1.111	100.000			

表4 成份得分系数矩阵

	元件				
	1	2	3	4	5
Age	0.134	0.493	0.139	-0.179	0.069
Peri	0.070	0.373	0.336	-0.423	-0.093
Edu	0.032	-0.103	0.493	0.628	-0.019
Title	0.063	0.431	0.122	0.479	0.244
Oback	-0.009	-0.205	0.587	-0.183	-0.526
ServiSts	0.490	-0.141	-0.052	-0.017	0.019
InstiLv	0.493	-0.121	-0.038	-0.004	0.014
Fback	-0.044	-0.243	0.360	-0.263	0.865

(二) 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N	Mean	sd	min	max
TFP_OP	1285	21.695	1.514	17.140	28.846
TFP_LP	1285	17.289	1.188	12.995	21.746
ENVIR	1285	0.545	0.069	0.403	0.658
TALENT	1285	0.000	0.465	-1.285	1.804
ROA	1285	0.046	0.057	-0.286	0.473
DTOA	1285	0.453	0.207	0.017	1.003
AGE	1285	19.300	5.707	4.000	66.000
RESEARCH	1285	4.284	7.368	0.000	21.414

从表5中可以看出,TFP_OP的均值为21.695,最大值为28.846,最小值为17.140,说明不同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较大,而相对于TFP_OP,TFP_LP的均值较小,为17.289,说明LP算法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比OP方法小。营商环境指标的均值为0.545,最小值为0.403,最大值为0.658,说明不同城市的营商环境差异不大。对于企业家才能,企业家才能均值为0,最小值为-1.285,最大值为1.804,说明不同企业家才能差异较大。企业家才能均值为0,企业家才能低于0的样本含义是这类企业家才能低于平均水平,企业家才能高于0说明企业家才能高于平均水平,由于SPSS主成分分析法默认为采用Z-score标准化,因此企业家才能出现负值从数据和算法上是正常的。企业年龄的平均水平为19.3年,最低为4年,最高为66年,说明企业的年龄差异很大,既包含处于成长期的企业也包含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本文采用企业资本性研发支出的对数衡量其研发投入水平,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21.414,说明有些企业没有资本性研发支出,有些企业在研发投入上投入的大量资金取得了研发成果。

表6是主要变量Pearson相关系数。TFP_OP和TFP_LP三者都在1%显著水平上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916,证明两种方法描述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在数量上有些许差异,但是显著性水平和拟合度都很高,因此可以在模型中作为替代变量。整体来看,营商环境和企业家才能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在OP方法和LP方法下都非常显著,营商环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1%的显著水平下正相关,说明在大多数情况下营商环境越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越大。企业家才能与在OP和LP算法下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同样说明一般情况下企业家才能越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越大。资本性研发支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而年龄和资产回报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较小。除了两种算法下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其余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5,说明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很小。主要变量间具有较为显著的相关性,因此可以进行模型分析。

表6 Pearson 相关系数

	TFP_OP	TFP_LP	ENVIR	TALENT	ROA	DTOA	RESEARCH	AGE
TFP_OP	1							
TFP_LP	0.916***	1						
ENVIR	0.085***	0.102***	1					
TALENT	0.114***	0.078***	-0.049*	1				
ROA	-0.095***	0	0.105***	-0.071**	1			
DTOA	0.481***	0.491***	-0.032	0.065**	-0.394***	1		
RESEARCH	0.181***	0.122***	0.036	0.110***	-0.088***	0.039	1	
AGE	-0.002	0.038	-0.003	0.004	-0.119***	0.149***	-0.018	1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三) 实证结果

本文首先对模型1和2进行OLS回归,如表7所示,回归式(1)显示企业家才能与TFP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拟合优度很小。考虑到模型的遗漏变量问题和稳健性,回归式(2)~(6)分别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营商环境(ENVIR)、资产负债率(DTOA)、资产回报率(ROA)、企业成立时间(AGE)、资本性研发支出(RESEARCH)。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模型的拟合优度逐渐增大到0.287,表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有很多。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多,企业家才能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系数由0.372逐渐降低到了0.240,但企业家才能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从结果来看,营商环境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也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作用,营商环境每提高1个单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就会增加大约2个单位水平。在表征公司特征的控制变量中,资产负债率、资产回报率、资本性研发支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企业业绩、技术水平的提高均有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企业的经营年限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初创期的企业处于资本报酬递增的阶段,创新效率和产出效率较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也较高,但是随着时间的增加,企业发展阶段转向成熟期或衰退期,企业的资本报酬率达到最高点或处于资本报酬递减阶段,不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回归式(7)用营商环境与企业家才能的乘积替代了企业家才能指标,发现联乘项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着非常显著的正相关性。但是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回归式(7)缺少了企业家才能这一非常重要的变量。因此在回归式(8)中重新引入企业家才能这一指标,以便区分是企业家才能本身影响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还是营商环境与企业家才能的交叉项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影响^[30]。式(8)表明在加入联乘项后,企业家才能由原来的显著正影响变成了不显著的负影响,但交叉项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作用,这就证明了营商环境门槛的存在^[32],根据式(8)的回归结果,当且仅当 $\gamma_1 TALENT_i + \gamma_3 ENVIR_i TALENT_i > 0$,即 $ENVIR_i > -\gamma_1/\gamma_3$ 时,企业家才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才为正。此时 $-\gamma_1/\gamma_3(-(-1.007)/2.297 = 0.438)$ 即为营商环境门槛值,只有在营商环境高于门槛值的地区,企业家才能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

表7 模型的 OLS 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7)	(8)
VARIABLES	TFP_OP	TFP_OP	TFP_OP	TFP_OP	TFP_OP	TFP_OP	TFP_OP	TFP_OP
TALENT	0.372 *** (0.089)	0.387 *** (0.088)	0.361 *** (0.088)	0.286 *** (0.079)	0.239 *** (0.077)	0.240 *** (0.077)		-1.007 * (0.609)
ENVIR		1.978 *** (0.613)	2.189 *** (0.615)	2.068 *** (0.533)	1.894 *** (0.524)	1.908 *** (0.523)	1.911 *** (0.522)	1.900 *** (0.522)
ROA			-2.551 *** (0.799)	2.837 *** (0.766)	3.200 *** (0.763)	3.073 *** (0.775)	3.076 *** (0.776)	3.055 *** (0.780)
DTOA				3.794 *** (0.200)	3.793 *** (0.198)	3.851 *** (0.198)	3.848 *** (0.198)	3.846 *** (0.199)
RESEARCH					0.033 *** (0.005)	0.033 *** (0.005)	0.033 *** (0.005)	0.033 *** (0.005)
AGE						-0.017 ** (0.007)	-0.017 ** (0.007)	-0.018 ** (0.007)
ENVIR * TALENT							0.472 *** (0.138)	2.297 ** (1.099)
Constant	21.700 *** (0.042)	20.620 *** (0.332)	20.620 *** (0.330)	18.720 *** (0.298)	18.650 *** (0.292)	18.960 *** (0.305)	18.960 *** (0.305)	18.980 *** (0.306)
Threshold								0.438
Observations	1,285	1,285	1,285	1,285	1,285	1,285	1,285	1,285
R-squared	0.013	0.021	0.030	0.258	0.283	0.287	0.288	0.290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表中数字表示相关系数,括号内的数字表示系数的Z检验值,下同

(四) 稳健性分析

1. 采用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使用LP方法计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_LP)作为TFP_OP的替代变量进行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从表8中可以看出,在回归式(1)~(3)中,企业家才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在加入资产负债率、资本性支出变量和企业年龄变量后,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强度有所下降,显著性水平由1%下降到5%。回归式(7)表明,在采用联乘项代替企业家才能时,联乘项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回归式(8)表明,同时加入企业家才能和联乘项时,企业家才能

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负相关性,而联乘项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从采用替代变量重新回归的结果来看,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为稳健的正向作用,但是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在某种程度上受地区营商环境的制约。此时的营商环境门槛值为 $0.458(-(-0.653)/1.427=0.458)$,即只有在门槛值达到0.458的地区,企业家才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影响才为正。此时的门槛值0.458高于原始估计的门槛值0.438,由于OP方法更倾向于高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采用LP方法替代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来说更符合真实水平,因此0.458门槛值也更符合真实水平。

表8 OLS 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7)	(8)
VARIABLES	TFP_LP	TFP_LP	TFP_LP	TFP_LP	TFP_LP	TFP_LP	TFP_LP	TFP_LP
TALENT	0.199*** (0.070)	0.213*** (0.070)	0.212*** (0.070)	0.147** (0.061)	0.121** (0.060)	0.122** (0.060)		-0.653 (0.461)
ENVIR		1.820*** (0.472)	1.826*** (0.476)	1.720*** (0.398)	1.626*** (0.394)	1.629*** (0.394)	1.632*** (0.394)	1.625*** (0.394)
ROA			-0.073 (0.611)	4.622*** (0.545)	4.819*** (0.543)	4.788*** (0.549)	4.791*** (0.549)	4.777*** (0.550)
DTOA				3.306*** (0.156)	3.306*** (0.156)	3.320*** (0.156)	3.318*** (0.156)	3.317*** (0.156)
RESEARCH					0.018*** (0.004)	0.018*** (0.004)	0.018*** (0.004)	0.018*** (0.004)
AGE						-0.004 (0.005)	-0.004 (0.005)	-0.005 (0.005)
ENVIR * TALENT							0.243** (0.110)	1.427* (0.836)
Constant	17.290*** (0.033)	16.300*** (0.258)	16.300*** (0.258)	14.640*** (0.222)	14.610*** (0.219)	14.680*** (0.235)	14.680*** (0.235)	14.690*** (0.236)
Threshold								0.458
Observations	1,285	1,285	1,285	1,285	1,285	1,285	1,285	1,285
R-squared	0.006	0.017	0.017	0.298	0.310	0.311	0.311	0.312

2. 内生性分析。为了计量模型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析了易出现的内生性问题,对于在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时所面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OP方法克服了OLS方法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所面临的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并用LP方法计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模型稳健性检验的替代变量。对于实证模型可能会出现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认为出现内生性问题的可能性很小或者内生性很弱。因为营商环境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理论上不会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区域营商环境的高低可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很大影响,但是作为微观个体的企业来说,其生产力水平不会对营商环境有影响,即使有影响,影响力也十分微小。对于企业家才能来说,企业家才能很可能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但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家才能的影响较小。企业家才能构成要素中的政府背景、金融背景、海外背景、年龄、学历等信息不会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所以本文认为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存在内生性问题和联立性问题的可能性较小或几乎没有。

3. 分类回归。为进一步考虑企业家才能对不同区域特征和产业特征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的影响差异,本文按照区域分布、产业类型两种细分标准对相关计量模型进行进一步分析和检验。

首先,按照区域分布将样本分成两大类,一类为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样本,样本数为953;一类为中西部内陆地区的企业样本,样本数为332。我国不同地区营商环境差异较大,但是营商环境整体呈现东部优于中西部的状态。根据测算,东部沿海城市的营商环境最好,排名前十名中有八名为东部以及沿海城市,重庆和武汉是前十名中仅有的中西部城市。

按区域分类的 OLS 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

表9 按区域分类的 OLS 回归结果

VARIABLES	东部沿海地区			中西部内陆地区		
	(1)	(2)	(3)	(4)	(5)	(6)
	TFP_OP	TFP_OP	TFP_OP	TFP_OP	TFP_OP	TFP_OP
TALENT	0.320*** (0.089)		-0.748* (0.880)	0.001 (0.148)		0.562 (1.812)
ENVIR	1.655** (0.735)	1.671** (0.735)	1.709** (0.735)	0.146 (1.606)	0.146 (1.606)	0.132 (1.625)
ROA	3.067*** (0.900)	3.063*** (0.902)	3.042*** (0.906)	3.313** (1.588)	3.311** (1.587)	3.308** (1.587)
DTOA	3.920*** (0.238)	3.917*** (0.239)	3.912*** (0.239)	3.744*** (0.367)	3.744*** (0.367)	3.743*** (0.367)
RESEARCH	0.035*** (0.006)	0.035*** (0.006)	0.035*** (0.006)	0.029*** (0.008)	0.029*** (0.008)	0.029*** (0.008)
AGE	-0.019** (0.008)	-0.019** (0.008)	-0.019** (0.008)	-0.013 (0.015)	-0.013 (0.015)	-0.013 (0.015)
ENVIR * TALENT		0.582*** (0.154)	1.891* (1.524)		-0.006 (0.310)	-1.186 (3.805)
Constant	19.120*** (0.453)	19.120*** (0.453)	19.100*** (0.453)	19.720*** (0.668)	19.720*** (0.669)	19.730*** (0.676)
Threshold			0.395			0.474
Observations	953	953	953	332	332	332
R-squared	0.287	0.288	0.289	0.297	0.297	0.297

从表9中可以看出,对东部地区而言,式(1)表明不加入交叉项时企业家才能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作用;式(2)表明采用交叉项替代企业家才能也表现出了非常显著的正相关性;式(3)表明营商环境门槛的存在,OP算法下的营商环境门槛为0.395。而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企业家才能与营商环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式(6)中交叉项系数为负,企业家才能系数为正,二者都不显著,本文因此认为企业家才能对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很小。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是东部沿海城市所具有先天的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吸引了大多数企业和更有才能的企业家,而中西部地区的营商环境和资源条件都比较弱,因此较难获得企业家才能的外溢效应。

其次,按照产业类型分类,将样本分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细分样本数分别为170和1115。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划分标准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2)》,其构成包括节能环保

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汽车。而传统产业则是排除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后的其余产业。

按照产业类型分类的 OLS 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

从表10中可以看出,对新兴产业企业,式(1)~(3)显示不加入交叉项时企业家才能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不显著的负向作用;采用交叉项替代企业家才能也表现出了不显著的负相关性;同时加入企业家才能和交叉项时,企业家才能系数为负,交叉项系数为正,但是不够显著。对传统产业企业,式(4)表明不加入交叉项时企业家才能对全要素生产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正向作用;式(5)表明采用交叉项替代企业家才能也表现出了1%的显著性水平上的正相关性;式(6)同时加入交叉项和企业家才能,交叉项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系数为1.959,企业家才能系数为负且具有显著性,证明了营商环境门槛的存在。

对比不同产业类型发现,企业家才能对于传统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要远大于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相对于发展较为成熟的传统产业而言,技术领先但同时某种程度上充满着更多不确定的战略新兴产业对于单纯廉价土地等硬要素之外的人才、行业氛围、地方政府管理等软要素或软支撑要求也日益提高,且越是高端人才,对除了工资之外的社会软环境如科教文卫等以及地方政府高效的管理服务越为看重。地方政府营商环境在战略新兴产业和一些新业态的产业发展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一些营商环境欠优的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在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中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表10 按产业类型分类的 OLS 回归结果

VARIABLES	战略性新兴产业			传统产业		
	(1)	(2)	(3)	(4)	(5)	(6)
	TFP_OP	TFP_OP	TFP_OP	TFP_OP	TFP_OP	TFP_OP
TALENT	-0.103 (0.198)		-2.498 (1.780)	0.284*** (0.082)		-0.780* (0.653)
ENVIR	2.362* (1.237)	2.398* (1.230)	1.760 (1.266)	1.906*** (0.570)	1.918*** (0.570)	1.935*** (0.571)
ROA	4.346* (2.316)	4.358* (2.318)	4.308* (2.294)	2.952*** (0.834)	2.951*** (0.836)	2.927*** (0.840)
DTOA	4.806*** (0.669)	4.804*** (0.668)	4.681*** (0.692)	3.747*** (0.209)	3.746*** (0.209)	3.749*** (0.210)
RESEARCH	0.026*** (0.010)	0.025*** (0.010)	0.027*** (0.010)	0.034*** (0.006)	0.034*** (0.006)	0.034*** (0.006)
AGE	-0.007 (0.016)	-0.007 (0.016)	-0.008 (0.016)	-0.019** (0.008)	-0.019** (0.008)	-0.020** (0.008)
ENVIR * TALENT		-0.127 (0.348)	4.411 (3.134)		0.546*** (0.149)	1.959* (1.182)
Constant	18.180*** (0.846)	18.160*** (0.833)	18.580*** (0.939)	19.030*** (0.330)	19.030*** (0.330)	19.030*** (0.330)
Threshold			0.566			0.398
Observations	170	170	170	1,115	1,115	1,115
R-squared	0.383	0.382	0.390	0.277	0.278	0.279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提出了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家才能可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可能取决于地方政府营商环境的门槛效应等相关理论假设,在此基础上,采用35个城市2016年的上市公司横截面数据,^①定量研究了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1)营商环境、资产负债率、资本性研发支出和资产回报率都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但是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着营商环境门槛,即企业家才能只有与一定的营商环境相结合,才能对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作用。(2)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着区域特征差异,由于营商环境的差异,东部地区的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要强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3)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也存在着产业特征差异,企业家才能对传统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要大于对战略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的实证结果也呼应了李克强总理提出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这一新理念。营商环境优势比较明显的城市更能吸引人才、资金和技术,更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当地的经济。但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会受到地方政府主导的营商环境门槛的制约,在某种程度上,营商环境发挥着类似“阀门”的作用。因此,要想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乃至整个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除了提高作为微观的企业家才能外,宏观上提高地区的营商环境,以更好地发挥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也同样重要。

对于当下的国内区域经济发展而言,企业家才能、资本、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要发挥协同效应和彼此增进效应在当前阶段很大程度上需要地方政府的高效管理和服务。国内任何企业的运营往往涉及土地、水、电、气、人才、社保等诸多手续,常需要和政府的多个审批部门打交道,而实际上,企业从意向签订-项目引进-项目投产-后期发展的整个链条中,必须办理的各种手续和要件数以百计,而这些手续办理往往是企业家所不擅长或是异常头疼的。良好的营商环境显然有助于降低企业支付包括时间成本在内的制度成本,使其在与制度成本较高的区域竞争对手相比,无疑在市场竞争中会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因此,当前全国许多发达地区都通过提升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入驻,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提升地方政府营商环境上,首先,地方政府应自上而下地构建“清和亲”的政商关系,营造一个透明化、公平化、便利化和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政府作为营商环境的主要营造方,应努力提高办事效率,进行机制体制创新,制定优化营商环境的相关合理性政策,并让相关企业有一直长期和稳定的预期,以此来打造优胜劣汰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其次,地方政府应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实行“不见面”审批、“承诺制”无审批等简化企业办事流程、“让企业家只跑一次”等节约时间和经济成本的举措,并听取更多自下而上的企业诉求,协同企业、高校等科研机构以及社会组织等,找到相关行业发展的痛点或难点(应更多集中于非企业家可以控制的一些制度或政策壁垒),以先行先试的名义去除一些制度和政策壁垒,更好地激发企业活力。

最后,从营商环境的内涵出发,虽然政企相关的办事程序和市场环境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成分,但随着百姓收入水平和提升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之前的“人随产动”日益转向为“产随人走”,且越是高端人才越是对单纯工资之外的软环境愈发看重,优美的生态环境以及高水平的教育卫生等社会精英配套产业对于营商环境的提升以及高层次人才吸引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提高营商环境的过程中,优美的生态环境和配套完善的社会公共服务也是应有之义。

^①由于本文计算的是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因此论文使用的数据是中国A股上市的公司数据。而实际上,由于A股上市公司均为规模较大、发展较为成熟且在当地具有较大的影响的企业,而对于许多发展实力不如A股上市公司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而言,这种地方政府营商环境主导的门槛效应和“阀门”作用可能会发挥更大影响。

参考文献:

- [1] 蔡昉. 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1): 56-71, 206.
- [2] 刘建国, 张文忠. 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关联效应研究[J]. 地理科学, 2014(5): 522-530.
- [3] 范剑勇, 冯猛, 李方文. 产业集聚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 世界经济, 2014(5): 51-73.
- [4] 程惠芳, 陆嘉俊. 知识资本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 2014(5): 174-187.
- [5] 王杰, 刘斌. 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经验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14(3): 44-56.
- [6] 闫志俊, 于津平. 政府补贴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的对比分析[J]. 产业经济研究, 2017(1): 1-13.
- [7] 毛德凤, 李静, 彭飞, 等. 研发投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PSM和GPS的检验[J]. 财经研究, 2013(4): 134-144.
- [8] 程晨. 技术创新溢出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经济科学, 2017(6): 72-86.
- [9] 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 何畏,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180-192.
- [10] 贺小刚. 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成长: 一个能力理论的拓展模型[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6(9): 45-48.
- [11] 孙丽燕. 企业营商环境的研究现状及政策建议[J]. 全球化, 2016(8): 106-119.
- [12] 贺小刚, 李新春. 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成长: 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2005(10): 101-111.
- [13] 刘芳, 梁耀明, 王浩. 企业家能力、关键资源获取与新创企业成长关系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4(8): 85-90.
- [14] 李唐. 企业家年龄效应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2015年广东制造业企业—员工匹配调查的经验证据[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9): 25-39.
- [15] WACH K. Impact of the reg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Southern Poland[EB/OL]. (2008-03-31) [2018-05-30]. <http://dx.doi.org/10.2139/ssrn.1113535>.
- [16] KLAPPER L, LEWIN A, DELGADO J M Q. The impa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the business creation process[C]// NAUDÉ W.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242-258.
- [17] 谢海东. 投资经营环境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 理论与实证[J]. 经济经纬, 2006(3): 104-107.
- [18] 张龙鹏, 蒋为, 周立群. 行政审批对创业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家才能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16(4): 57-74.
- [19] 魏婧恬, 葛鹏, 王健. 制度环境、制度依赖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 统计研究, 2017(5): 38-48.
- [20] 陈辰星, 耿雁冰. 2017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R]. 广州: 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 2017.
- [21] 鲁晓东, 连玉君. 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估计: 1999-2007[J]. 经济学(季刊), 2012(2): 541-558.
- [22] 柳获, 尹恒.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估计新方法——全要素生产率估计的结构方法及其应用[J]. 经济学动态, 2015(7): 136-148.
- [23] YASAR M, RACIBORSKI R, POI B. Production function estimation in Stata using the Olley and Pakes method[J]. Stata Journal, 2008, 8(2): 221-231.
- [24] 张志强. 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的比较与应用[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5(12): 107-123.
- [25] 陈阳. 企业家才能的价值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 2000(7): 84-89.
- [26] 寇元虎. 企业家才能的内涵、测量维度及实证研究——基于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数据[J]. 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5(9): 42-49.
- [27] ZHANG F, LI D. Regional ICT acc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China[J].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18(2): 188-198.
- [28] 世界银行集团. 中国营商环境报告[M].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8: 2-70.
- [29] 王学军, 孙炳. 我国文化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影响因素[J]. 开发研究, 2017(2): 73-78.
- [30] 薄文广, 马先标, 冼国明. 外国直接投资对于中国技术创新作用的影响分析[J]. 中国软科学, 2005(11): 45-51.
- [31] 张宇, 蒋殿春. FDI、政府监管与中国水污染——基于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分解指标的实证检验[J]. 经济学(季刊), 2014(2): 491-514.
- [32] 王志鹏, 李子奈. 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与内生经济增长[J]. 世界经济文汇, 2004(3): 23-33.

